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5.022

# 布瓦洛诗学的古典主义标签榷疑

王夏

(云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布瓦洛诗学不完全等同于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是其诗学内容的主要部分,但不容忽视的是其中也蕴含激情、感性、诗意的非古典主义思想。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的一致性与异质性并存的复杂样态凸显了文学精神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张力关系,折射出布瓦洛诗学对于文学的启示与关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典主义成就了布瓦洛诗学的深刻内涵。辨识布瓦洛诗学的多元集成,反思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是突破布瓦洛研究被标签化的必要途径。

**关键词:**布瓦洛诗学;古典主义;文学精神;时代精神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4)05-0177-08

尼古拉·布瓦洛·德普雷奥(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 1636—1711)是17世纪法国重要的诗人、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著有《诗的艺术》(*L'Art Poétique*)、《讽刺诗》(*Satires*)、《诗体书简》(*Épîtres*)、《唱经台》(*Le Lutrin*)、《小说人物的对话》(*Dialogue des héros de roman*)、《读朗吉努斯感言》(*Réflexions sur Longin*)、《论蒙娜丽莎》(*La Dissertation sur Joconde*)、《颂诗》(*Odes*)等主要作品,包括文艺理论、讽刺诗、颂诗、诗体书简、评论、信札等文体类型。除此之外,布瓦洛还将朗吉努斯(Longin)的文艺理论著作《论崇高》(*Traité du Sublime*)从古希腊文翻译成法文。

法国国内对布瓦洛诗学的研究从17—18世纪基于“理性”“趣味”的古典主义核心术语的反

思<sup>①</sup>开始,到19世纪由现代性引发的对古典主义价值的重估<sup>②</sup>,再到20世纪至今对布瓦洛诗学的冷静审视,这种研究的持续性表明布瓦洛诗学作为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文脉和欧陆诗学的重要环节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最近30年以来,布瓦洛诗学研究由基于古典主义的诗学理论探讨转向多维度的主题研究,学者们的关注视角由布瓦洛的“古典主义的立法者”身份转向其诗人、批评家、道德学家等身份,从多重维度探析布瓦洛诗学的道德内涵、讽刺艺术、批评理论以及崇高美学等多样化特征<sup>③</sup>。2021年,法国中学、大学教师资格会考《现代文学》科目围绕布瓦洛作品展开,其丰富的诗学财富再次激起人们的研究热情。

收稿日期:2024-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ZW008)

作者简介:王夏(1982—),女,云南通海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法国文学、西方文论和比较文化研究。

①这一阶段的研究以让-巴蒂斯特·杜博神父(Abbé Jean-Baptiste du Bos, 1670—1742)的《对诗与画的批判性反思》(*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sur la peinture*, 1719)、丹尼斯·高利尔(Denis Gaultier, 1688—1736)的《诗歌的规则》(*Règles de poétique*, 1728)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的《论趣味》(*Essai sur le goût*, 1757)为代表。

②这一阶段的研究以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 1804—1869)的《布瓦洛评传》(*Notice sur Boileau*, 1852)人物传记式的批评,发掘布瓦洛其人的特质及其对古典主义文学的贡献;费迪南德·布鲁内蒂埃(Ferdinand Brunetière, 1849—1906)的《布瓦洛的美学》(*L'Esthétique de Boileau*, 1889)注意到古典主义统摄下的布瓦洛美学特征,即“完美的语言和成熟的民族特质”;古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 1857—1934)的《布瓦洛》(*Boileau*, 1892)则升华了布瓦洛作为法国趣味和法国精神标识的文化内涵:“我们其余的法国人,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和骨髓里都有布瓦洛。因为我们都不会放弃真实、有趣、明晰和简洁”(参见Gustave L. Boileau. Paris: Brodard&Taupin, 1946, p. 205.)。

③参见Emmanuel B. “Boileau moraliste?” In Génétiot, Alain(éd.), *Morales du poèm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Classiques Garnier, 2019; Joseph P. *L'Univers satirique de Boileau: L'ardeur, la grâce et la loi*.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90; Pascal D. *Boileau et la satire noble*. Paris: Classiques Garnier, 2020; Delphine R. *Boileau poète. (De la voix et des yeux...)*. Paris: Classiques Garnier, 2016; Rainer Z, Wolfgang L. *Nicolas Boileau(1636—1711): diversité et rayonnement de son oeuvre*. Tübingen: Narr Francke Attempto, 2012.

遗憾的是,对于布瓦洛诗学的多样形态以及法国对布瓦洛诗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我国学界知之甚少。国内目前除了《诗的艺术》有中文译本,布瓦洛的其他作品并未有完整译本面世,这种译介情况影响了学界对布瓦洛诗学的深入研究。朱光潜、朱立元、刘旭光等国内知名学者将布瓦洛作为西方诗学史和美学史上“古典主义的奠基人”加以介绍,紧扣布瓦洛诗学的核心思想,论述精辟<sup>①</sup>。张颖认为17世纪法国美学存在与古典主义相悖的非理性特征,但对布瓦洛诗学的剖析仍局限于古典主义的框架之下<sup>②</sup>。

鉴于国内外布瓦洛诗学的研究现状以及布瓦洛诗学在西方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对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的关系进行认真的梳理和系统的总结。本文基于对布瓦洛作品的整体研究,剖析其诗学的真实内涵和价值,反思文学精神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张力关系,力求全面客观地厘清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的关系,进而为反思新时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照。

## 一 古典主义与布瓦洛诗学的内在联系

何为古典主义?这是厘清它与布瓦洛诗学的首要问题。学界对这一术语有不同的定义。伊曼纽尔·伯里(Emmanuel Bury)认为“古典主义”(classicisme)这一术语指涉的是被视为典范的,应该在教室里学习的古希腊古罗马作家,同属于文学史和思想史范畴。法国古典主义很早就被赋予伟大和庄严的思维特征,以至于它不像其之前或之后的文学流派一样需要撰写“宣言”才能明确其典范性<sup>③</sup>。这一点在1872年《利特雷词典》(*Le Dictionnaire de Littré*)对“古典主义”的定义中得到了证实:古典主义是指“古代作家的忠实拥护者或17世纪经典作家的体制”<sup>④</sup>。事实上,这与“古典”(法语classique,源自拉丁文classicus)一

词所包含的“第一等的公民”“作为模范和榜样的、最重要的”的词源学意义吻合。《法语宝藏:19、20世纪语言词典》(*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du 19 et du 20 siècle*)在古典主义的“典范性”层面上增加了具体的标准和特征,将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定义为以理性、高雅、和谐、明晰、简洁为具体标志的文学思潮<sup>⑤</sup>。

法国古典主义的这种具体标识具有极其深刻的理论内涵,这与它诞生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从历史与政治角度看,由于长期的宗教战争和阶级矛盾纷争,渴望和平与稳定成为17世纪法国民众的心声,建立和巩固绝对君主专制制度无疑是法国当时最大的政治诉求。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法国民众渴求欲望的解放和情感的宣泄,攀比、拜金等不良风气盛行,社会道德衰败。这种无节制的社会现实逐渐蔓延至文艺领域,催生了追求表达自由和表现手法极其夸张的巴洛克文学,“约在1590—1640年期间,一些巴洛克诗人为我们留下了有时近乎是病态的思索”<sup>⑥</sup>,后来进一步发展为矫揉造作、轻浮冗长的沙龙文学。与此同时,粗俗诙谐的市民文学泛滥。整个文坛充斥着混乱与失范的风气,它们腐蚀着人们的心灵,不利于专制国家的思想统一。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理性哲学的出现,为17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带来了希望。这种崇尚明晰、条理、秩序与完美的理性遂成为君王统治的法宝,古典主义应运而生。

基于这种历史和现实发展起来的古典主义推崇理性,是一种判断是非、鉴别善恶的能力,一种克制、审慎的尺度,它基于“像真性”原则(*la vraisemblance*),即作家所讲述和所再现的一切必须像真的,符合常情常理和当时社会理想的伦理规范,凸显了文学惩恶扬善、教化感化的社会功能。一方面,这在思想内容上决定了文学的高雅趣味和伦理导向。古典主义要求作家“首须爱理性:

<sup>①</sup>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朱立元:《西方美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页。

<sup>②</sup>张颖:《17—19世纪法国美学主潮》,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102页。

<sup>③</sup>Emmanuel B. *Histoire littéraire du 17<sup>e</sup> siècle*. Paris: Armand Colin, 2015, pp. 101—117.

<sup>④</sup>Emmanuel B. *Histoire littéraire du 17<sup>e</sup> siècle*. Paris: Armand Colin, 2015, pp. 101—117.

<sup>⑤</sup>Paul I. *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du 19 et du 20 siècle(1789—1960)*. Paris: Édition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77, p.893.

<sup>⑥</sup>让-皮埃尔·里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法国文化史II》,傅绍梅、钱林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sup>①</sup>。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的《熙德》(*Le Cid*, 1636)、《贺拉斯》(*Horace*, 1640)、《西拿》(*Cinna*, 1642)宣扬理性和荣誉至上,经艺术化的处理,塑造了个人情感服从于国家理性的民族英雄形象;拉辛(Jean Racine)的《菲德尔》(*Phèdre*, 1677)、《安德洛玛刻》(*Andromaque*, 1667)以无节制的欲望招致的悲剧结局从反面给予人警示,教育人必须学会用理智克制情感。这些都是体现古典主义思想性的扛鼎之作,既深刻动人又自然遒劲。古典主义这种思想层面的伦理性不仅仅体现在创作作品上,也体现在对作家的主观人格和道德修养要求上。古典主义主张文章道德一体。国王路易十四倚重布瓦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犀利尖锐的讽刺风格中流露出的正气和胆识,他想用布瓦洛鞭策那些平庸而自负的诗人,充分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古典主义的理性在表现形式上决定了文学追求完美的外在诉求。从17世纪初马莱伯(François de Malerbe)、沃日拉(Vaugelas)等人从语法、修辞学、诗学等方面大力提倡净化和规范法语,1634年黎世留(Armand-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组建法兰西学院,通过组织和编纂《学院词典》(*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规范法语以提供典范风格,到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技巧与风格,如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的《寓言》(*Les Fables*)朴实优美,拉罗福什科(La Rochefoucauld)、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的箴言体简洁明晰,莫里哀(Molière)用韵自然,在戏剧创作中遵循“三一律”,再到布瓦洛所编著的《诗的艺术》中的诗学法则,无一例外都体现了古典主义企求净化法语、革新法语,规范和整饬诗坛秩序的思想。从内容到形式,古典主义将笛卡尔的真善美同一的逻辑推演转化为对文艺创作和评价的要求和准则<sup>②</sup>,

不失为一种“文艺上的规范主义”<sup>③</sup>。虽然古典主义作为一种绝对君主专制的产物,从国王对文艺的扶植、掌控到法兰西学院对文艺自上而下的监管,不可避免具有“艺术国家化的特征”<sup>④</sup>,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但这也掩盖不了法国古典主义追求理性、规范和完美的深刻内涵。

布瓦洛诗学发轫于法国古典主义时期,二者关系密切。其联系就在于布瓦洛将古典主义对理性、规范与完美的追求视为文学的最高要求和标准。《诗的艺术》被誉为“古典主义的法典”,布瓦洛本人也因此得名“巴那斯山的立法者”<sup>⑤</sup>和“古典主义的代言人”<sup>⑥</sup>,诚如亚历山大·格芬(Alexandre Gefen)所说,“布瓦洛这位‘巴那斯山的摄政王’已经成为集规范与理性于一体的法国古典主义的象征”<sup>⑦</sup>。这让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的联系成为昭然若揭之事。当前国内学界习惯于将布瓦洛诗学贴上“古典主义”标签,将二者完全等同,正是基于对《诗的艺术》的认知。然而,这种一致性不仅仅体现在其文艺理论专著《诗的艺术》上,还体现在布瓦洛的其他作品中,它们形成了互文性的阐释空间,共同谱写了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的和谐乐章。

在《读朗吉努斯感言》和《论崇高》的法译本中,布瓦洛将思想的伟大和情感的高贵<sup>⑧</sup>视为朗吉努斯“崇高”概念形成的五要素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因素,理性与崇高的结合为崇高的思想和道德的力量找到了有力的支撑,丰富和深化了《诗的艺术》中的理性与文章道德合一的思想;在《论蒙娜丽莎》中,布瓦洛针对拉封丹和布雍对蒙娜丽莎这一人物的改写进行对比评述,并重申了“像真性”的批评立场<sup>⑨</sup>。在《小说人物的对话》中,布瓦洛批评了那些与历史或神话人物同名,却

①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②朱立元:《西方美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页。

③李思孝:《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④张颖:《17-19世纪法国美学主潮》,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17页。

⑤圣伯夫:《布瓦洛评传》,参见布瓦洛:《诗的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⑥布瓦洛被誉为“新古典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参见朱立元:《西方美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页)、“法国古典主义至高无上的指导者”(参见冯寿农:《法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外语出版社2019年版,第46页),布瓦洛遂成为当之无愧的“古典主义代言人”。

⑦Alexandre G. “Boileau, Nicolas”. In : Carole Talon-Hugon. *Les théoriciens de l'art*.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p. 89-90.

⑧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

⑨Nicolas B D.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 Gallimard, 1966, p. 322.

一点都不像他们的小说人物,他们文雅卑微的形象不像真的,因为真正的英雄必须伟大、威严,并富有高尚的感情,这印证了《诗的艺术》提出的“写英雄爱着美人,不过莫把他写得像牧人一样微温”<sup>①</sup>的“像真性”原则。在《讽刺诗》和《诗体书简》中,“理性”“真实”“道德”和“崇高”的意义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文论范畴,演变为布瓦洛对社会、人性、风俗和命运思考的准则。对于“从十五岁起见坏书就觉恶心”<sup>②</sup>的布瓦洛来说,“用讽刺诗改良道德风尚”<sup>③</sup>是他的志向,讽刺和批判不良趣味和平庸作家,捍卫“崇高的巴那斯”<sup>④</sup>是他的使命,追求完美的古典主义思想必然很容易走进他的心灵,最终逐渐内化为诗人的人格理想和诗学信仰<sup>⑤</sup>。这些著述与古典主义的理想信条上下呼应,有的丰富和深化了古典主义的思想,有的体现了布瓦洛作为诗人、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责任与担当。布瓦洛追求完美与卓越的人格理想、诗学信仰与理性、规范的古典主义思想互相融合,体现出二者内在的一致性。

## 二 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的异质性

作为滋生于古典主义氛围中的布瓦洛诗学,它与古典主义既联系甚密,又有所区别。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肇始于法国17世纪初期,繁荣于17世纪中叶,衰败自17世纪末期。法国文学史家郑克鲁把法国1610—1715年的文学思潮称为古典主义<sup>⑥</sup>。布瓦洛诗学则主要指从1653年布瓦洛开始步入文坛到1711年逝世的这个时期,涵盖古典主义的中后期。从本质上看,古典主义是文艺思潮,布瓦洛诗学是布瓦洛的诗学理论集成,是他对文学精神的独特阐释。布瓦洛诗学具有与古典主义相重叠的部分,但也包含平凡而真实的情感欲求、主观而感性的批评和诗意的沉思,它们与古

典主义迥然不同,从而构成二者的本质差别。

其一,古典主义以理性为圭臬,主张用理性控制情感,宣扬国家利益与国王荣誉至上的“大我”思想,很大程度上存在对“小我”世界的忽略和隐匿,布瓦洛作品中却不乏对个体平凡而真实的情感欲求的书写。在《讽刺诗一》(*Satire I*)和《讽刺诗六》(*Satire VI*)中,布瓦洛将对欺骗、偷盗等坏风俗盛行的巴黎的厌恶之情和盘托出。他企图逃离浮华而丑陋的城市生活,隐居乡村,在幽静的自然中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创作的灵感。在诗人眼中,“悲伤、贫困,与世隔绝的巴黎”<sup>⑦</sup>是诗人挥之不去的痛,唯有乡村才是他“唯一的避风港”<sup>⑧</sup>:“巴黎是富人的乐土。无需走出城市,他就能找到乡村。他可以在周围都是葱绿树林的花园里,把春天隐藏在冬季。徜徉于那满园的花香中,保持他那甜蜜的梦想。而我呢,多亏了这既没有光芒,也没有地位的命运,我居住在我可以住的地方,我的命运像在讨上帝开心一样。”<sup>⑨</sup>

即便巴黎式的宁静只属于富人,但乡村式的宁静与自由,却是布瓦洛一直追寻的梦想,是他的心灵栖息之地。在《诗体书简六》(*Épître VI*)中,布瓦洛在拉罗什吉永(La Roche-Guyon)小镇附近的小村庄把《讽刺诗六》中所描绘的这幅梦想的乡村画卷变成了现实:“我平静的内心在那里得到充分的享受。在那些日子里,帕尔卡女神追随着我。在挡住我所有欲望的小山谷里,我几乎获得了清新而踏实的乐趣。时而,一本书在手,漫步在草原中,那些有益的梦想填满我的理性;时而,我寻找构思的一句诗的结尾,在树林的一角,我找到那些逃离我的文字。”<sup>⑩</sup>

透过对乡村生活与自然的诗意描写,布瓦洛寄情山水的田园牧歌式理想与向往真诚与自由的内心吁求清晰可见。在那里,人与景、诗与思融为

①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②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③Emille M. *Bibliographie générale des œuvres de Nicolas · Boileau · Despréaux et de Gilles et Jacques Boileau*. Paris: Librairie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29, p. 8.

④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⑤参见王夏:《布瓦洛诗学的内在品质》,《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21年第3期;王夏:《布瓦洛论“诗与真”》,《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22年第4期;王夏:《布瓦洛形象论争之考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在此不再赘述。

⑥郑克鲁:《法国文学史(上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

⑦Nicolas B D. *Satires, Épîtres, Art poétique*. Paris: Gallimard, 1985, p. 68.

⑧Nicolas B D. *Satires, Épîtres, Art poétique*. Paris: Gallimard, 1985, p. 190.

⑨Nicolas B D. *Satires, Épîtres, Art poétique*. Paris: Gallimard, 1985, p. 93.

⑩Nicolas B D. *Satires, Épîtres, Art poétique*. Paris: Gallimard, 1985, p. 191.

一体,诗人最终也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和幸福。对于有着“不羁的性格、过分自由的脾气”<sup>①</sup>的布瓦洛来说,追求宁静的乡村生活是诗人寻求内心平静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诗人游离于理性,忠实于自我的写照。《诗体书简十一》(*Epître VXI*)是布瓦洛献给他的园丁安东尼(Antoine)的一首诗,他在奥特伊(Auteuil)的花园里亲切地与他交谈:“安东尼,这是疲倦和困难。世上的人们总是一副焦虑、局促不安的样子。”<sup>②</sup>这种对人性的洞察与忧思在《致布霍斯特的信》(*Lettres à Brossette*)和《致拉辛的信》(*Lettres à Racine*)中同样存在,我们总能感受到布瓦洛作为诗人、史官等多重身份的困惑和作为平常人的情感主张……这些直抒胸臆的表达既超出了古典主义教化和理性的范畴,又传达出一种与古典主义所宣扬的基于理性、荣誉与崇高的“大我”精神截然不同的、平凡而真实的“小我”世界。

其二,笛卡尔理性哲学以怀疑、演绎和推理为特征,追求思想的明晰与确凿,是法国古典主义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和研究文艺的方法。“直到 17 世纪中叶,法国作家要想有条不紊地处理较大的题材,从中得到一点可靠的知识,他面前唯一可以采用的方法就是笛卡尔的方法。”<sup>③</sup>然而布瓦洛作品中仍不乏主观而感性的批评,它们似乎与这种理性的方法无关。布瓦洛敢于点名批评众多名声在外的作家,责骂他们诗作平庸、道德败坏<sup>④</sup>。所得出的结论大多不提供详实的证据和论述,缺乏逻辑分析与推理,以至于其批评论被视为“文学审判”。再比如,布瓦洛对龙沙的批评有失偏颇,缺乏客观公正的立场<sup>⑤</sup>,对戏剧起源的错误描述<sup>⑥</sup>也反映出其批评的主观特征。

在《讽刺诗十》(*Satire X*)中,布瓦洛毫不掩

饰对妇女的厌恶和偏见:“总有一些放荡成性的女人,生活堕落,毫无分寸和规矩……她们身上有三点明显的特征:不守贞节、爱卖弄风情、吝啬。还有那古怪的坏脾气!”<sup>⑦</sup>这些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布瓦洛的主观感受,他对妇女的厌恶与其幼年丧母、痛失挚爱、终身未娶的悲苦经历以及对女性有限而敏感的印象密切相关,这种对妇女与婚姻的批判最终遭致贝洛(Charles Perrault)等人的强烈抨击<sup>⑧</sup>。这种主观式的任性批评在布瓦洛早期的讽刺诗中尤其突出。例如在《多样化诗歌和讽刺短诗四十九》(*Poésies divers · Epigramme XLIX*)中,布瓦洛写道:“您以更多的无知和愤怒抨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这些英雄,因此,您犯了同样的错误。贝洛先生,您是国王吗?您希望人们怎么称呼您?”<sup>⑨</sup>布瓦洛与贝洛之间结怨已久,这种批评明显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报复性,其任意和主观性大大削弱了批评力度。布瓦洛也因此树敌无数,被人视为疾恶如仇的、暴躁的“狮子”<sup>⑩</sup>。

其三,古典主义重视规则和说教,但在布瓦洛的作品中却不乏诗意的沉思。在《诗的艺术》中,伴有第一人称“我”的抒情性表达时常出现:“我宁爱一条小溪在那细软的沙上,徐徐地蜿蜒曲折在那开花的草场,而不爱泛滥洪流骤雨一般地翻滚,在泥泞的地面上挟着砂石而奔腾。”<sup>⑪</sup>这种诗性的表述取代了与“古典主义法典”契合的说教风格和具有规定性的无人称陈述(法语通常使用无人称代词 *on*),并且常常伴随着以第二人称“你”为标识的劝戒、征求与交流的口吻:“你也追随吧;要爱他语言纯净,效法他用字遣词既巧妙而又清明……从从容容写作吧。”<sup>⑫</sup>可以说,布瓦洛成功地“将诗歌的诗性思考与散文式的批评论述

①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8 页。

②Nicolas B D. *Satires, Epîtres, Art poétique*. Paris: Gallimard, 1985, p. 216.

③朗松:《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1 页。

④王夏:《布瓦洛形象论争之考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3 年第 1 期。

⑤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 页。

⑥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5 页。

⑦Nicolas B D. *Satires, Epîtres, Art poétique*. Paris: Gallimard, 1985, pp. 128-132.

⑧贝洛写了《为女人的辩护》(*Apologie des femmes*)回击布瓦洛反对妇女的《讽刺诗十》,参见郑克鲁:《法国文学史(上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06 页。

⑨Nicolas B D.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1966, pp.262-263.

⑩Nicolas B D. *Satires, Epîtres, Art poétique*. Paris: Gallimard, 1985, p.185.

⑪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 页。

⑫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13 页。

相结合”<sup>①</sup>，《诗的艺术》“并非写给博学者的论文，而是一首写给读者的诗”<sup>②</sup>，其间流露出作者诗意的沉思。

纵观布瓦洛的全部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与理性至上，严肃教化的古典主义思想主旨截然不同，布瓦洛诗学中那些任性、随意、主观的批评、抒情性的描述、感性的思考，或温润，或犀利，或诙谐，或尖刻……这些文本超出了古典主义文论的范围，披露出一个迥异于标签化的古板老夫子布瓦洛。那里有一个活生生的布瓦洛的思想和情感世界。其中的文字有声息，有心跳，较真切地披露布瓦洛的情感体验，呈现出有别于古典主义的诗学风貌。

### 三 古典主义成就了布瓦洛诗学的深刻内涵

上述对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的区分有助于人们全面深入地把握二者的特征，但这样的区分又面临将二者割离的危险。因为正是在古典主义的语境中，布瓦洛诗学才披露出文学精神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张力关系，显示出其深刻内涵。

何为文学精神？顾名思义即文学的精神，或曰赋予文学作为文学的活生生存在的精气神。换言之，文学精神是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依据，是体现文学活力和内核价值的凝聚。那么，文学原本的样子是什么？栾栋先生有一段话很有见地，他说：“从终极处透视，文学是一种非疆域的人文现象，它不是急功近利的反光镜，也不是玲珑剔透的象牙塔，更不是歌喉百转的鸚鵡鸟，而是与天地气息通感的人类文化原生态，是人类超越自身局限的化解性的精气神，是与社会正负价值切磋磨合的非自我中心话语。”<sup>③</sup>这种对文学本然的透彻领悟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应然（纯文学、雅文学）和文学已然（被现实权力话语所规

训和整合的文学或曰意识形态文学），它是文学文化的一体化，是雅文学与俗文学的集合，是人文世界的自然交响。“真如者，自然而然之生态，通天彻地之真谛。文学真如是什么？文学非文学，即文学既是文学而又是他化中的别样存在。”<sup>④</sup>这两种说法都统一于文学的本真生态，只不过第二种论述更抽象和概括。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文学精神必然不能仅仅“作为一种理性智慧的结晶和形而上的哲理品格”<sup>⑤</sup>。在栾栋先生看来，“文不成学，艺不受体，生于现实而非现实，处于社会而出社会，在思维机制中而逸出思维机制，这才是文学亦或艺术的真精神”<sup>⑥</sup>。“文学的根本品质在于化感通变，真正的精神就是通和致化。”<sup>⑦</sup>“通和致化”<sup>⑧</sup>折射出文学特有的气质、气度和秉性，是文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法宝。

而时代精神是标识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带有普遍性的精神文明，是体现一个时代共同的、能产生积极影响的集体意识。文学的精神与时代精神相关。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是应时代精神而生，必然应该反映时代精神，但不能过分依赖于时代精神而失去自我。过分拘泥于时代精神，文学精神殆矣。

17世纪的法国社会所呈现的精神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它体现在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等方方面面，也就是后来人们用“古典”这一术语所标示的那种体现时代精神的价值向度。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交叠的部分是他对时代精神的遵从，它与古典主义截然不同的非理性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布瓦洛对古典主义的僭越，然而这种“越轨”符合17世纪的真实样态：“走进17世纪，如西哈诺所说，就像走进另一个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别样或相反的世界，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文学，是一个有回声的大房间，还是一个新思

① Rainer Z, Wolfgang L. *Nicolas Boileau (1636—1711): diversité et rayonnement de son oeuvre*. Tübingen: Narr Francke Attempto, 2012, p.78.

② Delphine R. “Nicolas Boileau Critique, un cas historiographique”, *Littératures classiques*, 2015, 86(1): 254.

③ 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6页。

④ 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02页。

⑤ 李西建:《文学的发展与文学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⑥ 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7页。

⑦ 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60页。

⑧ “通和致化”是栾栋在《文学通化论》中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它立足文学本然与“大人文文学”的广阔根基，旨在从文学的渊源、发展历程与面临的新境遇深层反思文学和关照文学，倡导一种会通、开放、包容、厚道的文学精神。这种文学精神包含批判、自省的辟思性思维和自律、谦和的化性品质，是文学突破自蔽性，寻求他化和自我超越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学关照未来的品性诉求，更是文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必由之路。参见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想、新形式的催化剂和发动机。人们用它来表达和展现这种新爆炸和新思潮。这是一个创造小说、戏剧芭蕾、歌剧和革新戏剧的世纪,一个我们可以看见神圣的修辞学与风雅的交谈、崇高与诙谐、冉森主义与不信教思想并存的世纪,一个努力寻求和创造平衡的世纪。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仰被混乱的潮流推翻,就像是朝着某一秩序走来,并赋予其杂乱的意义。这种杂乱的意义即使在路易十四王朝的古典主义飞速发展的时期也同样存在,古典主义最终未能摆脱孕育它的一切。”<sup>①</sup>

这种杂糅了多种元素的形态是文艺复兴向启蒙运动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存在。17 世纪,那是一个古典文化盛行、备受瞩目的年代,一个文艺复兴之后文艺狂欢的巴洛克时代,更是一个王朝中心与资本萌芽、自由情绪与权利话语、主流意识与非主流意识碰撞和融合的时代。这一时代在理性精神的主导下生发出了多姿多彩的思想文化成就,诸如形而上学和以科学著称的哲学,如笛卡尔的新方法论,以形散思深的帕斯卡尔的哲理散文,以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都很出色的布瓦洛诗艺,以戏剧和社会批评兼美的高乃依、拉辛和莫里哀艺术,以文史哲皆好的拉封丹寓言……可以套用恩格斯评论文艺复兴的名言来评价 17 世纪的法兰西:“那是一个需要天才并且产生了天才的时代。”<sup>②</sup>我们甚至可以说,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法兰西为欧陆历史和文化挺起脊梁的辉煌时代。这个时代并非“古典主义”这一术语可以完全囊括和诠释的文学气象。

以“布瓦洛诗学”为例透析文学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布瓦洛诗学所揭示的文学精神更倾向于时代精神,或者说它向时代精神靠拢。这种趋于时代精神的“文学精神”自然不是文学的真精神,因为时代精神有可能被政治集团操纵和利用,限制和危害文学自身的发展,诚如栾栋所言,“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视

意识形态文学为文学精神的堕落”<sup>③</sup>。路易十四为布瓦洛发放年金、授意他为古典主义撰写法典、任命他为史官、力荐他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等种种迹象表明,布瓦洛诗学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也是他的诗学和古典主义被后人诟病的原因所在。布瓦洛诗学是被政治规训的应然和已然的合体,它倡导一种雅化的贵族趣味、普遍的真实和节情伦理的诗论,以歌颂国王的丰功伟绩为主调,抑制创作中的想象与情感自由,排斥和遮蔽文学的本真样态,很大程度上存在对诗学创造精神的抹杀和戕害,其狭隘、偏执的视角使诗学陷入非此即彼的僵化中,缺乏“通和致化”的品性,难以从根本上关照文学。

另一方面,布瓦洛诗学所揭示的这种趋向时代精神的文学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理想主义”<sup>④</sup>,寄托了布瓦洛追求完美的诗学理想。他将理性、规范、真实、与崇高视为维系文学命运与发展的最高标准和准则,将真善美合一的理念融入生命和文字里,从古典主义的《诗的艺术》到讽刺诗、诗体书简以及其他作品,从“巴那斯山的立法者”到讽刺诗人、批评家、书信作者和《论崇高》的译者布瓦洛,再到“古今之争”中的“崇古派”代表,毋庸置疑,布瓦洛始终对文学寄予深衷。“没有比真更美了。”<sup>⑤</sup>“一个有德的作家,具有无邪的诗品。”<sup>⑥</sup>“巴那斯多么崇高!精诗艺谈何容易!”<sup>⑦</sup>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所反映的是文学在彼时彼地的一种至高至美的理想,极其纯粹,但不无意义。它始终代表了人类心灵深处对文学的最高守望和期许,其坚守和捍卫精神家园的初衷和热忱是无可厚非的。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这种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学思想最终迎来了古典主义文学的繁荣,成为文艺复兴向启蒙时代过渡这一特殊时期的诗学象征,也促成了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强盛。这是古典主义和布瓦洛诗学对法国文学和历史的

①Jean S. “Pour un autre XVII<sup>e</sup> siècle”, *Dix-septième siècle*, 2015(3):537-538.

②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他写道:“这是地球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场最伟大的革命……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学识、精神和性格方面的巨人。”(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 2019 版,第 405 页。)

③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304 页。

④Joseph P. *L'Univers satirique de Boileau L'ardeur, la grâce et la loi*. Genève: Librairie Droz S.A, 1990, p.330.

⑤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3 页。

⑥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3 页。

⑦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 页。

独特贡献。布瓦洛诗学逸出古典主义的独特而多样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它对古典主义的僭越和创新。然而布瓦洛在努力向时代精神靠拢的同时却难以企及文学之真精神。布瓦洛诗学所披露的这种张力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对于文学的研究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古典主义成就了布瓦洛诗学的深刻内涵。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布瓦洛,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三百多年前的作家能够理解我们今天所说的“通和致化”的文学精神。布瓦洛诗学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其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性造成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无比珍贵的诗学财富。在新时代的我们要坚持文学的真精神。首先,要领会文学本然的思想,以“大人文文学”的视野从本根处充实我们的头脑。因为“没有本根上的圆观宏照,只能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性、个性话语与共性话语、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等问题上争高论低”<sup>①</sup>。其次,要掌握“文学非文学”的辟思智慧,以“界外”、迂回的视角在反思、自省中突破常规,因为没有辟思式理会,就容易陷入是此非彼的僵化与执念中,“过分拘泥正反,执着心物,藩篱科别,文学殆矣”<sup>②</sup>。最后,要培养文学的化性品质,谦以自牧、厚德载物、

润泽天下、关照未来。自由、民主、和平和开放的新时代精神为文学打开了宽阔而高远的天空,让我们从布瓦洛诗学中获得经验并吸取教训,秉持“通和致化”的文学精神,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让文学在新时代绽放绚丽的光彩。这就是布瓦洛诗学所披露的文学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张力关系对文学的启示,为我们全面理解文学和新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反思和参照。

### 结语

布瓦洛诗学所体现的思想内涵远远比人们给他的标签“古典主义”更丰富和深刻。布瓦洛诗学不完全等同于古典主义。追求真善美合一的完美境界是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共同的内在逻辑,但布瓦洛诗学中包含的个体生命体验与内心情感的真实欲求、主观、感性或诗意的沉思却构成其独特的思想内涵。这些区分有助于厘清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的区别与联系,但又面临将二者割离的危险。因为,正是在古典主义的语境中,布瓦洛诗学的非古典主义特征才有意义,它所披露的文学精神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张力关系才得以显现,我们才得以收获如此丰富、独特而深刻的诗学财富。

## Questions About the Classicism Label of Boileau's Poetics

WANG 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Boileau's poetics is not completely equivalent to classicism. Classicism is a major part of its poetics contents, but it cannot be ignored that it also contains non classical ideas, such as passion, sensibility, and poetry. The complex pattern of the coexistence of consistency and heterogeneity between Boileau's poetics and classicism highlights the ten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spirit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reflecting the inspiration and care of Boileau's poetics for literature.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classicism has achieved profound connotations in Boileau's poetics. In addition, recognizing the diversity of Boileau's poetics is the essential way to break through its being labelled.

**Key words:** Boileau's poetics; classicism; the spirit of literature; the spirit of times

(责任校对 徐宁)

<sup>①</sup>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9页。

<sup>②</sup>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7页。